

# 大陸「文革」在逐步「修正」中

劉懋柵

## 前言

共匪的文化大革命，撇開「破舊立新」不談，其對外方面的任務是「反修」、「反美」。美是「美帝」；修是「蘇修」——即所謂「現代修正主義」，也是數年來共匪攻擊蘇聯的罪名。

在毛匪看來，黑魯曉夫是機會主義者，在核子武器威脅下向資本主義國家屈服，將蘇聯導向「和平共存」，背叛了馬列主義。不僅使蘇共誤入歧途，整個共產集團也都蒙受損失。中共欲免蹈覆轍並重振共產陣容，非大樹毛澤東思想，推行文化大革命不可。這是毛匪發動「文革」的動機，也是鬥爭劉、鄧的目的。然而，事與願違，形勢比毛匪更強；兩年以來，不但未能「反修」，其「文革」本身倒非修不可，這不獨是「文化大革命」的失敗，同時也是毛匪個人的悲哀。

## 一 「十六條」出於無奈——第一次

### 妥協

匪黨中央於五十五年八月八日通過一項所謂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」決定。該決定全文五千五百字，共分十六條，其中強調這次「文化大革命」在推行之中「有這樣那樣的缺點」，「目前的阻力是巨大的頑強的」；因而，允許羣衆「自我批評」、「自由申辯」。顯露出「文革」初期所採的過激手段，已招致了知識份子及黨內幹部的劇烈反抗。毛匪處此嚴重情勢之下，乃

不得不作出這個無可奈何的決定，以緩和匪黨內外的反抗情緒，從這個決定中，充分的看出了毛匪的退讓與妥協：

(一)「決定」本身言不由衷——共匪此次「文化大革命」一開始，情況就非常混亂，有的「右派」被鬥，有的「左派」也被鬥，是非莫辨，涇渭不清，例如：偽「南京大學」校長匡亞明最初曾領導學生貼「大字報」，大罵反黨黑幫，但不久反被整肅撤職；匪黨廣東省委會「文化革命小組」組長楊康華，自己也于同(55)年七月間被匪鬥倒等等。匪在此一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」之決定的主要內容，也處處含糊不清。由於在說法上與「整肅初期」矛盾，其「決定」的本身也越顯得言不由衷；該決定第五條說：「黨的領導要善於發現左派，爭取中間派，團結大多數，最後達到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，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羣衆，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。……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，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，但也說過一些錯話、做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，嚴格區別開來；注意資產階級的反動學問，反動「權威」，同具有一般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，嚴格區別開來。」這條「決定」與當時「文革」的實況對照，實在充滿了矛盾與混亂。因為：○吳晗本以文章肇禍，既然「寫過一些不好文章」的人不算右派，又何必把他整肅。○彭真、鄧拓都是「又紅又專」的匪幹，如稱他是「資產階級」，誰又是「一般資產階級」？尤其第六條更說：「要保護少數，因為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裏！即使少數人意見錯誤，也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；在進行辯論的時候，要用文鬥，不用武鬥」。既承認真理有時在「少數人手裏」，「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」，「不用武鬥」；又何必「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右派」？這不但使局外人

感到模糊，就是「匪幹」也無法理解。

(二)毛匪向「反黨」份子讓步——匪黨五十五年七月一日出版的「紅旗」雜誌社論中刊出了「三家村」黑幫的十大罪狀。其中第一項是「抗拒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」，第八項是「招降納叛、結黨營私」；當時是怒目戟指對這些「黑幫」人物要盡殺無赦，而決定中的口氣則大不相同。該「決定」始則稱：「在這樣大的革命運動中，他們（指匪幹）難免會有這樣那樣的錯誤，……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，就不可避免地會有阻力；這種阻力，目前還是相當大的、頑強的」。繼而又稱：「由於阻力比較大，鬥爭會有反覆，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覆，……它將使勞動羣衆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，不平坦的。」（詳原「決定」第二條）再則說：「因為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裏，即使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，也允許他們申辯，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；在進行辯論的時候，要用文鬥不用武鬥。」（詳原決定第六條）最後說：「在運動中，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、放火、放毒、破壞、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份子，應當依法處理外，大學、專科學校、中學和小學學生的問題，一律不整。」（詳原決定第七條）對已被鬥爭倒的右派份子，也「給他們出路，讓他們重新做人。」（詳原決定第八條）這幾條「決定」也何嘗不是在「招降納叛」，其與前文對照，不啻自掘嘴巴。毛匪的兇相突然變成了「笑臉」。如此，不但已向「反黨」份子妥協讓步，即當初殺氣騰騰的「文化大革命」，也一變而為一紙防火、防盜的「保防」條例了。

(三)對文化人、技術人員、科學家實施「懷柔」——此次「文化大革命」之初，匪新華社曾播稱：「所謂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』，是『右派黑幫』進行反黨的護符，我們與資產階級決無平等可言，一定與他們作『你死我活』的鬥爭」。爾後各地匪報也都刊出一些「文化人」的名字，並大肆攻擊與辱罵，同時揚言「政治」要落實到思想上，不可落實到業務上；也就是說：科學技術人員不是把工作作好就可以，必須要「突出政治」才算及格。但匪黨此一「決定」的第十一條則說：「對哲學、歷史、教育、文藝、自然科學理論等反動觀點的批判，在報刊上點名批判，應當經過同組織黨委討論，有的要報上級黨委批准。」第十二條又說：「對科學家、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，只要他們是愛國的，是積極工作的，是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，是不私通外國的，在這次運動中，都應該採取團結、批評、團結的方針！對有貢

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，應該加以保護，對他們的世界觀和作法，可以幫助他們逐步改造。」「這些「決定」一出，將原來對「文化人」及「科學」工作者「一面倒」的「打擊」和「整肅」，統統收回。其取而代之的則是「幫助」和「保護」。

上列各情，與「文革」初期的作法頗不相稱，「文革」既未停止，自然是暫時變象的妥協。據事後獲悉：當時黨內反毛份子勢力雄厚，在現有一七二名中委中（匪黨本屆中委共一九五名，但已有二三名死亡。），忠毛的僅有五十二人，佔總數百分之三十。反毛的有一〇六人，佔總數百分之六十一。其餘百分之九態度曖昧。毛匪既居於少數，自然孤立寡援；為了使「文革」持續下去，不能不委曲求全；十六條就是在反毛派高壓壓力下的產品。

## 二 紅衛兵被迫撤退——第二次妥協

「十六條」既非毛匪的本意，他對「文革」自不會輕易放鬆，因此，毛林派面喊叫「十六條」，暗中則策劃使用暴力，果然自五十五年八月廿日以後，紅衛兵即紮裏出場，分赴各地「造反」，整個大陸被攪成一片混亂。

依照「十六條」的規定：指揮紅衛兵的中央機構，就是陳伯達和江青主持的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」，各級機構是「文化革命委員會」和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」，但事實上，非常混亂，一個地區或一個學校都不只一個紅衛兵組織，名義上毛、林匪是紅衛兵的正、副總司令，但實際上具有約束能力的還是各地軍區的司令員（當時大都兼任各地紅衛兵輔導員）。

紅衛兵出現後首先展開「破舊立新」，各地災難隨之而來，如私設法庭審訊地主、資本家，搗毀寺院古物，毆打匪幹，焚燒教堂，比比皆是，罄竹難書。當時各地紅衛兵形同蝗虫蟻羣，滿山遍野都是「革命無罪」、「造反有理」的呼聲，寫着「砸爛朱德的狗頭」、「賀龍原是一個土匪」的大字報也出現在北平街頭。同時各地的武鬥事件也次第展開，如五十五年八月廿八日，青島有四萬工人圍攻紅衛兵。八、九月間甘肅先後發生工農羣衆與紅衛兵衝突事件八次。據五十六年元月廿五日匪香港大公報載：「……浙江「紅太陽」報評論員文章說：「黃河兩岸、大江南北，全國熱氣騰騰，大鳴、大放、大字報、大辯論、大串連、大宣傳、大鼓動、大游行、大集會、大發傳

單、大張旗鼓，一片大動盪。一言以蔽之，就是「亂」。『匪區當時的實況，概可想見了。』

在此一時期，毛匪共接見了八次紅衛兵，除第一、二兩次含有鼓勵其「造反」的意味之外，以後的六次都帶有籠絡安撫的作用。第八次（五十五年十一月廿五、廿六兩日）接見紅衛兵大會的主持人康生曾說：「……這是明年春暖以前最後一次接見。」顯示毛林派對紅衛兵的「串連」、「造反」已失去興趣與信心。

五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，人民日報轉載「紅旗」雜誌十五期的社論「奪取新的勝利」中說：『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，他們還在玩弄新的花樣，利用「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」這一口號招搖撞騙，混淆視聽，他們實際上是攻擊革命左派，砲打無產階級司令部，……有些人犯了路線錯誤，他們並沒有做認真的公開的檢討，不肯給那些在文化革命中被他們打成「反革命」、「反黨份子」的革命羣衆平反。他們還採取軟硬兼施的辦法對付羣衆，繼續組織被他們矇蔽的羣衆，來打擊革命左派。他們顛倒是非，妄圖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名加在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頭上。……包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』。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發覺三個問題：

①各地的反毛、反共份子都打着「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」的招牌，到處亂闖，使「造反派」涇渭莫辨，大感棘手。

②基於上述原因，「造反」的革命師生把許多毛派心目中的左派打成「反黨」份子。

③爲了緩和形勢，減少混亂，毛林派已着手爲被誣害而錯打成反黨份子的「左派」申冤平反。

此一社論發出之後（可能當時在黨內另有通知），在紅衛兵造反期間被鬥的匪幹遂起而訴冤，地主、資本家和大大小小的「黑五類」，也都羣起要求「平反」，一時串連高潮甫過，「平反」之聲又起。茲依據敵後消息，略舉數例如次：

①北平匪自展開「文化大革命」以後，對資本家大肆迫害，除分別抄家劫奪最後一點財產及迫使主動要求取消定息外，並勒令彼等及家屬一律返回原籍或下鄉生產。彼等因不堪壓榨，至五十五年十二月底止，已返平要求「平反」者有二、三萬人。

②天津匪於五十六年二月上旬實行「平反」，某廠職工在「文化大革命」中被非法拘留五十二天，匪廠方當局對此已承認錯誤，被沒收之傢具、衣物，在「平反」後雖已退回，但仍有損失。

③上海某資本家在「紅衛兵」暴行中被抄家，匪已於五十六年元月中旬將掠奪財物全部退還，僅損失一部份壽衣，另該市場姓資本家亦被抄家，但匪幹已登門認錯，公開賠禮道歉，並准許恢復其名譽。

與「平反」同時併來的，是各地武鬥事件的增多與加劇。無論北平、上海、武漢、廣州，到處都是「工農」與紅衛兵鬥，「地方」紅衛兵與「中央」紅衛兵鬥，當權者與造反者鬥。工人實行「三停」——停水、停電、停交通。農民實行「三光」——分光、吃光、用光。形勢演變至此，毛林派也大感恐慌，不但其原定於五十六年春推行的紅衛兵大串連計劃（以東南、西北等地區爲主要目標。）悄然終止，即對正在串連中的紅衛兵也不得不迅速撤退。

首先，匪黨中央軍委於五十六年一月廿八日發佈「八條命令」，其第四條規定一切外出串連的院校學生，應迅速返回本區，本單位進行鬥、批、改。其次，匪黨中央與僑務院於二月三日聯合發佈「關於停止紅衛兵長途步行串連的通知」，其第一條是：「長途步行串連，在全國都停止」。

接着，匪黨中央於二月四日發出「關於小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」，規定「在外地串連的小學教師和學生，應當返回本校，進行鬥、批、改」（第二條）。二月十九日發出「關於中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」，規定「從三月一日起，中學師生（包括一九六六年應畢業而尚未畢業的學生）停止外出串連，一律回校，下鄉下廠的亦一律回校，一邊上課，一邊鬧革命」（第二條）。三月七日又發出「關於大專學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定」，亦規定「派赴工廠、農村及外地串連（包括各地聯絡站人員）的大專學校革命師生，一律於三月二十日以前趕返本校，參加本校的文化大革命」（第二條）。三月十九日，下令正式宣佈「繼續停止全國大串連，取消原定的去（五十六）年春暖後進行大串連的計劃」。

紅衛兵發動的目的，對內原是「大破四舊」、消滅「黑五類」、肅清黨內的「走資派」，但紅衛兵造反的結果倒招來了普遍反毛的大禍，爲了穩

定情勢，防範巨變，不得不停止串連暫時收兵，先求安定，徐圖發展。在毛匪看來，這種釜底抽薪的辦法，當可達到三個目的：

① 對反毛份子減少刺激，安撫要求「平反」的羣衆，穩定混亂形勢。

② 恢復交通秩序，維持正常運輸，俾工商業不致繼續敗壞惡化。

③ 使農村公社停止鬥爭，加強春耕，以免造成糧荒。

但是，紅衛兵易放難收，儘管高喊「復課鬧革命」，而革命師生則相應不理，仍在各地攪鬧。至四月廿日，匪黨中央、偽國務院、匪黨中央軍委、中央文革小組等四個單位乃聯合發佈「關於停止外出串連的通知」，結果收效仍微。

自紅衛兵串連之後，匪區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即宣告停頓，惟自去（五十六）年十一月開始，大陸的征兵活動又陸續發現，按共匪的役齡年限爲十八至二十三歲，今年征兵的對象恰好是紅衛兵。據今年二月十九日巴黎法新社電：「據來自北平的報導說，根據今天北平外交界不斷傳聞，在過去幾週內，有五十萬紅衛兵併入中共陸軍」等情，相信這是紅衛兵最後的出路，也是其必然的下場。

### 三 「文革小組」忍疼整肅——第三

#### 次妥協

「文革」初期的高潮，是五十五年六月三日改組「北京市委」，把第一書記彭真鬥倒揪出，由李雪峰接替。同年七月，即成立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」，他的組織成員如次：

組長：陳伯達

第一副組長：江青

副組長：王任重、劉志堅、張春橋。

組員：張平化、王力、關鋒、戚本禹、穆欣、姚文元、謝長厚、劉維貞、鄭季翹、楊植霖。

顧問：陶鑄、康生。

「中央文革小組」的成立是爲了領導各地的文化大革命，就這個名單來

大陸「文革」在逐步「修正」中

看，核心人物自然是江青；其基本任務是「整團、整黨」。故一開始它的權力即遠駕乎「黨」之上；當時外界都稱「文革小組」是黨中的黨，是毛林集團的領導核心。其間雖有副組長王任重、張平化等遭受整肅，但其本身的權力並未削減。以後「紅衛兵」串連，「奪權」鬥爭等等，「文革小組」都起了領導作用。

去（五十六）年五月以後，各地武鬥激烈，毛林派「奪權」受阻，有的地區在醞釀兵變，毛林派乃派遣親信，分別赴各地進行安撫；其間謝匪富治曾到過雲南並頗有收獲，一時演局稍趨好轉。

同年七月中旬，武漢反毛的「百萬雄師」結合地方武裝與造反派互鬥，情勢日趨嚴重，毛林集團復派謝富治、王力前往排解，謝匪代表治安當局，王力代表「文革小組」。但當地局勢混亂已久，反毛羣衆早已取得駐軍的同情，他們敢於和造反派爲敵，自然不把北平的使者擺在眼裏。七月廿日反毛情緒再度惡化，羣衆怒不可遏，謝、王二匪遂遭毆辱，王力更幾乎送掉性命；這就是衆所週知的「武漢事件」。事變的翌日，匪新華社發表了以「空軍司令部紅衛兵」署名，題爲「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」的文章，廿二日「人民日報」予以轉載，這篇文章首次將匪「黨內、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」並列。

八月一日，「紅旗」雜誌同時發表兩篇社論，一是「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」，一是「向人民的主要敵人猛烈開火」；這兩篇社論中都曾幾次提到「軍內一小撮」或「黨內、軍內最大的一小撮」。據事後觀察，這兩篇社論可能是出自王力之手。自此以後，揪出「軍內一小撮」的呼號便由各地掀起。於是軍中匪幹只要略嫌不穩，即被指爲「趙永夫、譚震林、陳再道」等反毛人物。當時把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呼爲「廣老譚」（意謂廣州的譚震林），把廣州的某一張軍長稱作「張再道」（意謂廣州的陳再道），這樣揪的結果，軍中匪幹多感不安，毛匪視爲「文革柱石」的解放軍，漸漸動搖起來。

恰當此時，北平造反派中出現了一個「首都五、一六紅衛兵團」，該團造反的對象，不是一般的「牛鬼蛇神」；而大都是毛匪週圍的大將，下列兩例，略可提供證明：

○「五、一六」兵團在天安門貼的大字報中說：「幕後操縱砲打齊華同

志的混蛋，你跑不了！」「對抗毛主席關於薺華問題的指示的混蛋罪該萬死！」，當時都曉得這是對林彪而發的（見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「廣州三司紅衛兵」報）。

○「五、一六」的反動口號是：「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派——周恩來！他們的反動指導思想是：『周恩來之流的要害是背叛』五、一六通知。」「周恩來是劉、鄧在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最後支柱。」「周恩來是二月黑風的總後台。」（資料來源同前）

八月五日，王力向北平紅衛兵講話，他說：「目前全國各大軍區，大部份聽從毛澤東，但許世友（南京軍區司令員）和韓先楚（福州軍區司令員）等是聽從徐向前的；徐向前和賀龍是『反黨份子』」。王力的講話和「五、一六」兵團的作法全相吻合。事後不久，許世友、韓先楚，以及王新庭等便都去北平參加「毛澤東思想學習班」。

這時王力等更指使「革命羣衆」到處設聯絡站。招兵買馬搶奪軍隊的武器，壯大自己的隊伍。「五、一六」兵團在廣州的「中南林學院」、長沙「一中」及瀋陽等地擴充勢力，連西藏的「造總」也乘機抓了過來。八月廿一日，並發生暗殺張國華、梁興初等未遂事件。江西軍區司令員吳瑞山、海軍東海艦隊司令員楊勇等同時都被打倒。

在此以前，走「皇后道」（江青）成功擁有「外交英雄」頭銜的姚登山，自印尼回平之後，於「五一」勞動節晚會中被毛匪接見，以後就變為「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」的重要人物，以極左的面目活躍在外交部門，這時也很快的把陳毅揪了出來。

「武漢事件」之後，雖說「揪軍中小撮」，但發展的結果變成了一大片，從朱德、賀龍（早有前案）到徐向前、陳毅，以至許世友、韓先楚，再加上東北、西南正在暗算而尚未明揪的「王老譚」、「張再道」，甚或連「副統帥」林彪也榜上有名。屈指數來，「洪同縣」裏已經沒有好人了。從「紅旗」雜誌八月一日發出「揪軍中小撮」起到八月廿日破獲「五、一六」兵團止，前後共廿天；把整個「解放軍」揪得惶惶不寧。軍中反毛派的忍耐，至此已達飽和點，稍一不慎，可能引發巨變。毛匪深感形勢不妙，遂不得不大罵王力，他說：「王力廿天的錯誤，比陳毅四十年的錯誤還大，打倒王力！打倒！打倒！」。就因為這樣，匪報很快就刊出「反革命份子王力」，

「王力是國民黨的特務」。

依實情而論，王力也有其來頭，他不但在文革中得寵於江青，而且是毛匪得力的「筆桿子」，匪黨中央在民國五十二年九月至五十三年七月，發表的一至九篇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」，都是出自王力的手筆。然而，在筆桿與槍桿決鬥的時候，毛匪也只有把他犧牲。這和「長坂坡」戰役之後的劉備一樣，如不把阿斗摔哭了，怎能顯出他對趙雲的信任和關愛呢？！

「五、一六」兵團破獲以後，發覺其主要份子都來自「中央文革小組」，他們是：

王力：文革小組成員，匪黨中央宣傳部負責人，「紅旗」雜誌第一副總編輯。

穆欣：文革小組成員，光明日報總編輯。

戚本禹：文革小組成員，「紅旗」雜誌副總編輯。

林杰：文革小組秘書。

此外，根據可靠資料顯示，連江青也扯在裏面。去（五十六）年九月五日，江青對安徽來京代表講話時曾說：「……北京有個反革命組織，叫「五、一六」兵團，他人數不多，表面上也是青年人，青年人是上當了；「五、一六」以極左的面目出現，他集中目標反對總理，實際上我們每個人的黑材料它都整理了，什麼時候都可以向外拋的。心裏沒鬼怕什麼！他們過去就整理過我的黑材料，這次才發現。有個專案小組在上海，去拿材料的時候，說戚本禹同志講是我的，他們沒辦法就拿來了，拿來以後，我也沒有過問；你看够噲，一大箱囉。最近發現有的地方成立所謂「特黨、特別黨」，這也都是小丑的手法……」。由這裏看出，在上海整理黑材料的專案小組，完全聽從戚本禹的命令；戚本禹、王力、穆欣、林杰等又都是江青手下的頭號紅人，他們領導的組織，江青怎不知情？從這一角度觀察，表面上雖說打垮「五、一六」兵團，實際上是整肅「中央文革小組」；事實上自王力等垮台之後，「文革小組」就消聲匿跡，不再飛揚跋扈。這些內幕，共匪雖不肯公佈，但蛛絲馬迹都會顯出「謎底」。否則，江青突然「害病」一百十八天（自去（五十六）年「十、一」偽慶稱病不出，至今年元月廿六日始見露面），也就無法解釋了。

斯摩棱斯克省 Smolensk	N. I. 卡爾米 克 Kalmyk	(一九一三 年生) 五五 歲	一九五七—一六二二年任斯摩棱斯克省書 記、一九六三—一六四年任斯摩棱斯克 農業省黨部第一書記、一九六四年升 斯摩棱斯克省黨部第一書記。	俄共第二十三屆被選為檢委。
唐波夫省 Tombov	V. I. 切爾寧 Cherny	(一九二二 年生) 五六 歲	一九六一—一六二二年任唐波夫省蘇維埃 主席、一九六三年任唐波夫省農業蘇 維埃主席、一九六四年升該省黨部第 一書記。	

(36) 阿姆爾省 Amur 省，黨部第一書記 S. S. 阿夫拉敏柯 Avramen-ko。(37) 托木斯克省 Tomsk 省，黨部第一書記 Y. K. 里加切夫 Ligachev，俄共第二十三屆被選為候補中委。(38) 羅斯托夫省 Rostov 省，黨部第一

——上接第38頁

## 四 結論

到目前為止，共匪的文化大革命可說已作了三次「修正」；也可說是三次妥協。第一次是遷就黨內的壓力，第二次是爲了維護交通，保全財經設施，第三次是面對匪軍低頭，忍疼「犧牲車馬」。如將「文革」視同貨品，則第一、二次是減價求售，第三次則是虧本拍賣，每況愈下，不待言宣。

目前，「文革」雖仍然持續進行，但毛林派所持的態度却與前期不同；「揪軍中一小撮」固然啞口不提，即「奪權」鬥爭也逐漸「走了樣」。去(五十六)年「紅旗」雜誌第三期社論說：「奪權原則是不能把現成地接受過來，不能採取改良主義，不能合二爲一，不能和平過渡，而是把它澈底打碎」。所謂「三結合」是原機構的擁毛幹部，造反的革命羣衆，和當地部隊負責人，成立三位一體的「革委會」聯合掌權，但實際情形已不盡如此。就今年元、二月份奪權成功的甘肅、河南、河北三省而言，革委會的成立只是除當地黨委之外加上軍方負責人——甘肅省革委會主任委員洗恆漢是蘭州軍區

書記 I. A. 班達林科 Bondarenko。(36) 哥爾基省 Gorky 省，黨部第一書記 K. F. 卡都曉夫 Katushev，俄共第二十三屆被選為中委，九六名新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之一。

政委，副主任張忠是甘肅軍區司令員，另一副主任胡繼宗是省委書記。河南革委會主任劉健勛原爲中南局書記兼省委第一書記，副主任王新是河南省軍區第二政委，委員張樹芝是河南軍區司令員。河北革委會主任李雪峯原任華北局第一書記，並繼彭真出任北平市第一書記，第一副主任劉子厚原任華北局書記兼河北省長，另一副主任馬輝是河北省軍區司令。他們都是道地的當權派。所謂「革命羣衆」都不再出頭。尤其劉健勛、李雪峯、劉子厚，在文革高潮時都遭受過造反派的攻擊，被指爲「走資派」的代表人物；劉子厚更曾於去(五十六)年元月至五月間，在保定爲毛派多次拖出鬥爭，並強迫其穿紅袍、戴紙帽遊街示衆，極盡侮辱之能事。曾幾何時，他們又都成爲奪權勝利的新貴。其對「文革」本身而言，何止一大諷刺。

據二月廿一日東京美聯社電：「去(五十六)年十二月十一日，廣州「南國通訊」(刊物)刊載，「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謝富治」演說稱，中共第九屆黨員大會將於本(五十七)年五、六月間舉行，並暗示劉少奇、鄧小平均將出席」。由此推斷，共匪黨內的妥協氣氛不僅瀰漫未散，甚且有增無已；「文革」的前途可能逐漸的變質了。